

閻崇年自選集

籍士閣叢題



閻崇年

著

·天合·地合·人合·己合



阎崇年◎著



關東滿族研究

翁士南敬題



九州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阎崇年自选集 / 阎崇年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108-4061-6

I. ①阎… II. ①阎… III. ①中国历史—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2315号

阎崇年自选集

作 者 阎崇年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32.25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4061-6
定 价 9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阎崇年

《阎崇年自选集》的缘起，始于九年前的一件小事。时任九州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李勇先生，自己花钱买了《明亡清兴六十年》，通读全文，提出疏误。我知道后，即奉寄给先生《明亡清兴六十年》彩图本一部，表示敬谢。随之，九州出版社黄宪华社长找我约稿，鉴于已经出版二十五卷本的《阎崇年集》，拟议出版《阎崇年自选集》。于是，从《阎崇年集》内五本论文集——《燕步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满学论集》和《清史论集》中，初拟选目，多次切磋，并同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博士阎天讨论，最后从一百一十三篇拙文中，选取二十七篇，增加新作两篇，结成本集。

本集二十九篇文章，分为六组：第一组《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等二篇，为综论类；第二组《论努尔哈赤》等八篇，为人物类；第三组《论宁远争局》等六篇，为战史类；第四组《论满学》等五篇，为满学类；第五组《张吉午与〈康熙顺天府志〉》等五篇，为考据类；第六组《明永乐帝迁都北京述议》等三篇，为京华类。

青丝意气涉猎多，白发素心囊献少。学术研究，贵在恒久。一个历史学者，穷其毕生精力，做学术论文，一年两三篇，总算不过数十篇而已，除去应时、应景、应急、应命之作外，真正能够观点新、资料新、论述新、语言新的新作、力作、佳作、名作，会有几篇？而论文中，几年之后，几十年后，几百年后，读之有用，品之有味，又会有几篇？著名清史学家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论著集刊》收文，上册十九篇，下册二十五篇，续编四十五篇，合计八十九篇。时过近百年，先生学术著述，仍具学术价值。这说明学术论著应经得起历史的、地域的、学术的、国际的检验。

求真求理，史法自然，这是我治史的旨趣。研究历史，最难之处，在于两点：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

一生颠簸，志在于学。学术之路，漫长曲折，求真求理，笃志弥坚。吾二十岁后步入史学领域，五十岁始于清史领域攀登，六十岁始于满洲学中开拓，七十岁始于影视史学探索，八十岁始于森林文化研究。借用屈原《离骚》中文字作为本序结语：“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是为自序。

目 录

自序	1
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	1
清朝历史的文化记忆	18
论努尔哈赤	36
皇太极经略索伦辨	50
顺治继位之谜新解	67
康熙：千年一帝	79
明珠论	92
于谦六百年祭	105
论戚继光	121
论袁崇焕	138
论宁远争局	161
袁崇焕固守宁远之扬榷	189
论觉华岛之役	207
论大凌河之战	221

论明末北京保卫战	240
辽西争局兵略点评	259
论满学	276
满洲神杆及祀神考源	296
后金都城佛阿拉驳议	308
清宫建筑的满洲特色	314
满洲初期文化满蒙二元性解析	331
张吉午与《康熙顺天府志》	342
清郑各庄行宫、王府与城池考	364
雍正理王府址考	379
《无圈点老档》及乾隆钞本名称诠释	395
于谦《石灰吟》考疑	416
明永乐帝迁都北京述议	441
京师慈寿寺塔考	464
北京宫苑的民族特征	486
感谢辞	499
《阎崇年自选集》编辑札记	501

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

【题记】本文《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是应辽宁大学学报副主编孙琰之约，作为特稿，发表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本文第一次在史学领域提出中华五种经济文化类型——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沿海及其岛屿的海洋文化，第一次在史学领域论述森林文化的定义、特征、演变及其作用，并论述其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多年历史演进中分合、盛衰的变局，阐述森林文化与中华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特别论述满洲兴起的森林文化元素，最后统和于大中华文化。

中国的森林文化，从历史学的视角，就其在中华文化演进中的历史变局，兹格物，求致知，同探讨，增共识。

一

白寿彝先生论道：“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现有的和曾经有过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①研究中国的历史，可以按一朝一代地研究，也可以从文化类型去研究，还可以有其他。中华文化，既统一，又多元，文化类型不同，彼此聚合交融。

在中华文明五千年发展进程中，以其不同生存空间为依托，逐渐形成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就其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可以概括为五种经济文化类型，即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沿海及其岛屿的海洋文

^① 白寿彝：《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题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北京。

化等。在中华文明五千年演进中，从甲骨文算起，以文字记载的历史有三千多年。这三千多年的历史，按千年分段，考察其文化变迁，主要发生了三个千年变局。在中华文化三个千年变局中，于中国大一统皇朝，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都时间或长或短地占据过主导或主体的地位，而高原文化和海洋文化虽都很重要，却没有占据过主导或主体的地位。在占据过主导或主体地位的上述三种文化类型中，中原农耕文化的存在与意义，学界早已取得共识；西北草原文化的存在与意义，学界也已取得共识；至于东北森林文化，就相对比较而言，过去史料少、踏查少、研讨少、著述少、交流少、关注也少，因而从历史学的视角对森林文化进行论述，经过初步检索，至今没有见到专题论文，也没有见到学术专著。

森林文化在中国暨在东北亚空间上是客观存在的，其在不同历史时段、不同地域范围，都影响着中华历史发展，影响着东亚历史格局，也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因此，本文的旨趣在于，阐述森林文化的称谓、舆地、语言、历史、特征、经济、文化、聚合、交融、演变及其在中华一体多元文化中的地位及影响。

森林文化的研究，有从林学、生态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角度进行研究，特别是从林学角度进行研究，已经取得一系列的成果。如郑小贤的《森林文化内涵及其价值》，苏祖荣、苏孝同、郑小贤合著的《森林文化及其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地位》^①等，均着眼于林学研究范畴，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本文是从历史学的视角对森林文化进行探讨和研究。

东北森林文化，因居住人群的生存环境不同，其生活资源、生产方式、获取手段、居生样式、社会组织和文化习俗等也不同。东北的森林文化，范围颇为广泛，不能逐一涉及，本文讨论有六：一是文化称谓，二是历史地图，三是语言特征，四是渔猎经济，五是文化宗教，六是历史传承。兹于下面，分别阐述。

文化称谓。中国在明清盛时，长城以北、大兴安岭以东至大海，外兴安岭到贝加尔湖以南的广袤地域，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三千年间，其地域文化特征，如何进行学术称谓？就地方史研究，已见不全资料，主要有十二说：(1) 关东文化；(2) 东北文化；(3) 关外文化；(4) 边外文化；(5) 松嫩文化；(6) 辽海文化；(7) 长白文化；(8) 北方文化；(9) 三江文化；(10) 黑水文化；(11) 龙江文化；(12)

^① 苏祖荣、苏孝同、郑小贤：《森林文化及其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地位》，载《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白山黑水文化等^①。就民族史学、文化史学、社会史学等而言，对其经济文化类型的概括，或为牧猎文化、或为渔猎文化、或为游牧文化、或为草原文化等，存在不同的称谓。

上述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概括，虽各有其道理，也各有其优长，但似有其不足——或于生存方式阐述、或于地理区位界定、或于历史时段描述、或于语言文化诠释，均没有突出森林文化的生存环境及其历史文化特征，也没有概括其文化内涵。因此，有待商榷，值得研究。

由是，我将东北地域的文化，总称之为“森林文化”。这样称谓的一个理由是，古代森林文化人们的生存环境，东北地区森林莽莽、树海无际，而东北的“森林”同中原的“农耕”、西北的“草原”相对举，以显现其生存地理环境、地域经济文化类型的特征。当然，任何概括都有局限，学者各自表述，不必强求划一；但是，大家取得共识，便于学术交流。

历史地图 中国在明清盛时，农耕、草原、森林、高原、海洋文化的地理范围，按生存环境，绘历史地图，虽较粗略，亦欠准确，但做比较，冀求讨论。

中原农耕文化，分布很广，但其重心在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区，主要地区包括黄河、长江、珠江中下游地带等，其现今面积：北京（1.64）^②、天津（1.19）、上海（0.6）、重庆（8.24）、河北（19）、山西（16）、河南（17）、山东（15.7）、陕西（20）、甘肃（45）、宁夏（6.6）、江苏（10）、浙江（10.18）、安徽（14）、江西（17）、福建（12）、湖南（21）、湖北（19）、广东（18）、广西（24）、四川（48.6）等二十一个省市区，约三百四十五万平方公里，其中如川西北主要是高原，其面积约近四十万平方公里。因此，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等地区中原农耕文化核心地域面积约三百多万平方公里。

西北草原文化，分布极为广阔，其主要地区东起大兴安岭，南临燕山、长城和天山一线，西迄巴尔喀什湖地带，北达外兴安岭至贝加尔湖一线。中国盛清时草原文化的面积：漠南蒙古即今内蒙古（118），漠北喀尔喀蒙古即今外蒙古（156.5），以上内外蒙古面积共近二百七十五万平方公里。还有天山以北漠西的厄鲁特蒙古（西蒙古）地区等。总之，中国盛清时西北草原文化区域的面积，合计约为三百多万平方公里。

^① 参见宋德金：《东北地域文化三题》，《光明日报·史学》2009年7月14日；田广林：《辽海历史与中华文明》，《光明日报·史学》2009年12月29日。

^② 括号内的数字，以万平方公里即万平方千米为单位，下同。

东北森林文化，分布极为辽阔，中国盛清时主要范围，包括大兴安岭以东，长城一线以北，东达大海，北到贝加尔湖、外兴安岭、库页岛（今萨哈林岛）一线的广阔地域。包括：今辽宁省（15）、吉林省（19）、黑龙江省（47），共约八十万平方公里；明清盛时乌苏里江以东至滨海地区约为四十万平方公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六十万平方公里，还有贝加尔湖以东以南等地域，其面积总数约为三百万平方公里。

西部高原文化，主要包括今西藏（123）、青海（72）、云南（39）、贵州（18），总面积约二百五十二万平方公里，还有川西高原等；另从高原地域看，青藏高原（257）、云贵高原（50），总数亦约为三百万平方公里。

东南海洋文化，明清盛时的地理范围，包括今黑、吉、辽、冀、津、鲁、苏、沪、浙、闽、粤、桂，即从鄂霍次克海、鞑靼海峡、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到南海的沿海地域，及今台湾岛（3.6）、海南岛（3.5）、香港特区（0.11）、澳门特区（0.0033），以及南海诸岛屿——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南至曾母暗沙。海岛及沿海的海洋文化，其领土与海疆的面积，本文不做统计^①。海洋文化虽非常重要，却从来没有在中央政权占据主导或主体的地位，而农耕、草原、森林文化又缺乏海洋文化基因，海洋文化是中国两千多年皇朝史上的文化短板，成为后来屡败于从海上打来的西方列强的一个重要文化原因。

由上可见，森林文化就其历史地图而言，在中华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分量与重要地位，可谓：举足轻重，牵动华夏。

语言特征 森林文化地域居民的语言，基本上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中华民族语言文化圈，南部主要属于汉藏语系等，北部主要属于阿尔泰语系等。汉藏语系主要包括汉语、藏语、苗语、瑶语、壮语、土家语、彝语等；阿尔泰语系主要包括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主要分布在西北草原文化地域，包括今蒙古语、达斡尔语、布里亚特语、土族语、东乡语、裕固语（东部）等；满—通古斯语族则主要分布在东北森林文化地域，包括满语、锡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等。蒙古语族与满—通古斯语族的地理界限，大致以大兴安岭为界（语言分区不是绝对的）——大兴安岭以东到海、外兴安岭以南到长城，主要是满—通古斯语族的森林文化范围。他们彼此之间的语言

^① 盛清时新疆约215万平方公里（今新疆166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地域文化类型，有学者认为：北疆为草原文化，东疆和南疆为农耕文化。今与蒙古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印度八国接壤，陆地边境线长5600公里，占全国陆地边境线的四分之一。

虽有差异，但彼此基本可以听懂。有人经常问：皇太极的一后四妃都是蒙古人，他们怎么沟通、怎样交流呢？他们的语言都属于阿尔泰语系，语法相同，借词亦多，彼此之间，大体听得懂。总之，东北森林文化的语言，主要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满—通古斯语族。当然，也不是那样纯粹单一。

渔猎经济 森林文化的早期居民，居住地的选择是：面朝河流，背靠山林，生活资源为渔猎所获。主要的生活资源——衣、食、住、行、用、贡，多取自于森林。其衣，以兽皮或鱼皮缝制，被称为“鱼皮鞑子”；其食，吃兽肉、鱼肉或野果，也是来自于森林、河湖；其住，撮罗子（又称仙人柱），以桦木和桦树皮为主要建筑材料；其行，爬犁是木结构的，船是用树木和桦树皮做的；其用，椀筷、器皿、摇车、箱篓、盒包，渔猎器具等也多是木制品或皮制品；其贡，主要朝贡楛矢、人参、貂皮、明珠等，则都是木制、采集和渔猎的产品。所谓“使犬部”“使鹿部”，也是森林文化的产物。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跟外域经济文化的交流，森林经济逐渐多元化，包括采集、渔猎、畜牧、农耕等。但在元明清时期，森林文化的基本经济形态是渔猎经济，这是同草原文化以游牧为主，农耕文化以耕织为主的重大区别。直到满洲崛起之初，《满洲实录》记载：“本地所产，有明珠、人参、黑狐、元狐、红狐、貂鼠、猞猁狲、虎、豹、海獭、水獭、青鼠、黄鼠等皮，以备国用；抚顺、清河、宽奠、瑷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洲民殷国富。”^①这说明森林文化的采集、捕鱼、狩猎，仍是满洲的重要经济基础。

文化宗教 森林文化的一个特征是对森林、对大木的崇拜。《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昼夜酒会，群聚歌舞，舞辄数十人相随，蹋地为节。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诸国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号为‘天君’。又立苏涂，建大木，以县铃鼓，事鬼神。”^②这里的“大木”，《晋书·四夷列传》记载，肃慎氏视之为“神树”^③。直到清朝皇族的堂子祭祀，仍然是“堂子立杆大祭”。史载：“每岁春、秋二季，堂子立杆大祭，所用之松木神杆，……砍取松树一株，长二丈，围径五寸，树梢留枝叶九节，余俱削去，制为神杆。”^④从堂子祭祀图可见，

① 《满洲实录》，第2卷，第37叶，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北京。

② 《后汉书·东夷列传》，第85卷，第2819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65年，北京。

③ 《晋书·四夷列传·肃慎氏传》，第97卷，第253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北京。

④ 《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第3卷，第18叶，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台北。

就像是一幅森林的画图。《满洲源流考》也记载：“我朝自发祥肇始，即恭设堂子，立杆以祀天。”^①甚至在北京大内坤宁宫前也立神杆以祭神祭天。而在古代的日本，森林覆盖大地，寺庙祭祀的是“御柱祭”。这里的“御柱”就是树木，象征着森林。日本的寺庙，有的没有神，只有树木。有书记载：“日本的神社里有森林。在日本，可以有没有森林的寺庙，不可能想象神社里会没有森林。”^②森林文化的宗教，同草原文化等一样，阿尔泰语系诸族在古代都信奉萨满教，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满洲等都亦然。其教名“萨满”，就是从满语“samān”的音译而来的。阿尔泰语系的满—通古斯语族，从晚明至清，其文字为满文，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由努尔哈赤主持、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③。满文系借用蒙古文的字母，来拼写满语。满文为拼音文字，同汉文方块字不一样。西方人学满文，因都属拼音文字，比汉人学满文更容易一些。汉语则属于汉藏语系，二者在语言与文字上有较大的差异。

历史传承 森林文化，历史悠久。考古资料表明，早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东北森林文化就已经产生。《后汉书》首列“东夷列传”，记载中原王朝与四周民族的关系，特别记载中原王朝与肃慎的关系：“及武王灭纣，肃慎来献石砮、楛矢。”^④先秦时肃慎、秦汉时挹娄、魏晋时勿吉、隋唐时靺鞨、宋辽金时女直、元明时女真，以及清初的满洲，一脉相承，连绵不断。

综上所述，中国东北森林文化作为一个历史文化范畴，既有其自身的文化特点，则应有其学术文化的称谓，从而有利于学术研究。

二

中国东北森林文化的历史，有文字记载以前的考古资料和口碑传说，本文不做讨论。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多年历史演进中，其兴盛衰亡、分合迁徙的文明史，从殷商到清末（1911年），大体分作三个阶段，发生三个千年变局。

第一个千年 主要是商、周。这段历史的一个特点是最高君主称王，如殷纣

① 《钦定满洲源流考》，第18卷，第1叶，商务印书馆《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本，2005年，北京。

② [日]梅原猛：《森林思想——日本文化的原点》，卞立强、李力译，第34页、第129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北京。

③ 《满洲实录》，第3卷，第2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④ 《后汉书·东夷列传·挹娄传》，第85卷，第2808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65年，北京。

王、周文王、周武王等。东、西周八百年，加上殷商，大数算一千多年。我把这段千年历史称作王制或王国时期的历史。周朝的政治中心，虽然诸侯名义上共尊周天子为国君，但西周天子在镐京、东周天子在洛阳——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等，“尊王攘夷”、各自为政、相互兼并、彼此杀伐，实际上是政治多中心的。

这个时期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内部关系，在争变中融合，在融合中争变。中原的农耕文化，以农作为食，以桑麻为衣，农桑为衣食之源。虽然还有畜牧业、手工业等多元经济，但是以农耕经济为主。

商周活动的中心区域，殷主要在今河南，周主要在今陕西。周先祖名弃，号后稷，《史记》记载：弃好耕农，种稼穡，被帝尧举为农师。殷与周，两大文化板块进行碰撞与交汇。周武王会八百诸侯于河南孟津，讨伐殷纣王。牧野之战，纣王发兵七十万，结果殷兵大败。纣登鹿台，赴火而死^①。殷亡周兴，崛起于西北的周族，进入中原，确立统治。“周虽旧邦，其命维新”^②。周朝初期，封诸侯、建藩国、行世袭、食采邑，社会的权力与财产，既照顾先朝旧贵族的利益，更扩张当朝新贵族的权益，除旧调整，重新分配。

周从殷纣灭亡，到周平王东迁，周的都城，因在西部，史称西周。西周末年，社会动荡，内乱外祸，政局不安，迁都到洛邑。从平王东迁，到秦的统一，周的都城，因在东部，史称东周。从此，周朝政治中心东移，文化中心也随之东移。在东周时期，春秋也好，战国也罢，既是社会经济大发展的时期，也是社会文化大融合的时期。这段历史时期的一个特点是：强凌弱，众暴寡，战争频繁，动荡不安。春秋五霸，各国之间，今日为盟邦，明日则为敌国。战国七雄，或合纵，或连横，“七雄虓阚，龙战虎争”^③。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其立国自存，其图强争霸，关键所系，文化之争。

从文化来说，第一个千年历史，主要是中原农耕文化内部的交融。西周的战乱，东周的纷争，主要是八个文化圈，即北方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河洛文化、秦晋文化，南方的吴越文化、楚湘文化、巴蜀文化、南粤文化，在冲突、融合、对话、交流。上千年的交融，出现一个结果：秦统一六国，“六王毕，四海一”^④，车同轨，书同文，中原农耕文化一统，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与核心。新统合的民

^① 《史记·周本纪》，第4卷，第12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北京。

^② 《诗经·大雅·文王》，《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北京。

^③ 《汉书·叙传上》，第100卷上，第4227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62年，北京。

^④ 杜牧：《阿房宫赋》，《樊川文集》，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上海。

族本应称为秦族，嬴秦短祚，刘氏立汉，且秦始皇焚书坑儒，得罪儒生，而儒生又有话语权，中原人开始不称秦人，而自称汉人，标志着汉民族形成。

这一千年，殷商甲骨文、周朝钟鼎文、商周青铜器、西周石鼓文等，都是这个时期的华夏珍宝。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诗经》的情志，《周易》的智慧，《孙子兵法》，屈原《离骚》，诸子百家，竞相争鸣，思想精华，令人惊叹！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放射出人类文明史上的璀璨光华。但是，在这场文化大交融中，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周殷牧野之战，“血流漂杵”^①。秦赵长平之战，秦武安君白起斩级、坑杀赵军四十五万人^②，可谓惨烈之极！这段历史，极不平静。付出与收获，碰撞与融合，阴阳交替，相辅相成。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③中原农耕文化融汇的艰难历程表明：历史在曲折演进，欢歌伴随着悲怆。

这个时期，东北森林文化的肃慎，已同中原王朝有往来。《尚书》《大戴礼记》《国语·鲁语》《山海经》《竹书纪年》《汉书·五行志》等都有“肃慎”或“息慎”同中原王朝来往的记载。《尚书》里说：“武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④《史记·五帝本纪》尽管有传说的元素，但有肃慎的传说和记载。书里的“息慎”，其“集解”引郑玄曰：“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也。”^⑤肃慎又称稷慎，《逸周书·王会解》曰：“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塵。”孔晁注：“稷慎，肃慎也。”但是，《史记》和《汉书》虽都留下美妙动人的故事^⑥，却没有为肃慎列传，直到《后汉书》才出现《挹娄传》。这说明此期森林文化在中华文化圈里，虽有交往、屡见记载，却因山河阻隔，尚处边缘状态。

^① 《尚书·武成》，第11卷，第185页上，《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北京。

^②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第73卷，第2335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北京。

^③ 司马迁：《报任安书》，《昭明文选》，第41卷，第578—579页，世界书局影印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上海。

^④ 《尚书》，第18卷，第236页中，《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北京。

^⑤ 《史记·五帝本纪》，第1卷，第43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北京。

^⑥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有隼集于陈廷而死，楛矢贯之，石磬，矢长尺有咫。陈湣公使使问仲尼。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磬，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肃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分异姓以远方职，使无忘服。故分陈以肃慎矢。’试求之故府，果得之。”（《史记·孔子世家》，第47卷，第2317页，中华书局校点修订本，2013年）

第二个千年 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 年），到后梁贞明二年即辽太祖神册元年（916 年），共 1138 年，大数算也是千年。这个千年间，除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继续交融外，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交融——秦汉与匈奴、隋唐与突厥的交融是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这个时期文化冲突，一个重要特点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冲突，前期对匈奴，后期对突厥——都是汉藏语系文化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

这个千年，《史记》有《匈奴列传》，《汉书》有《匈奴传》《西域传》（各上下两卷）共列五十一节，《后汉书》则有《西域传》《南匈奴列传》，这些说明匈奴与西域在此期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此期有个历史现象值得注意：出现西汉、东汉、西晋、隋和唐五个统一的朝代。当朝的政治中心，秦都咸阳，西汉都长安，东汉都洛阳，都城的变迁，沿着黄河中游、渭河干流地域在东西摆动，但摆动的重心在长安（今西安）。

秦始皇连接六国长城而为万里长城，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守长城，又派公子扶苏监兵，主要是防匈奴。秦亡的直接原因是农民军的揭竿而起，间接原因则是劳民修长城、重兵防匈奴。否则，蒙恬率大军对付陈胜、吴广，扶苏在始皇身侧，那么，陈胜之兵与赵高之谋，恐均难以遂其所愿，历史会是另种局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秦亡于匈奴。秦亡汉兴，亦有悲歌：“高祖忍平城之耻，吕后弃慢书之诟。”^① 这说明当时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冲突之激烈。西汉，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大战匈奴；东汉，“匈奴尝以万骑入渔阳（今北京郊区），（张）堪率数千骑奔击，大破之，郡界以静”^②。汉设立西域都护府，唐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都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交融的政治之果。

这一千年，文化繁荣，气势博大，世人震撼。万里长城、阿房宫殿、秦陵兵马俑、汉墓马王堆，司马迁的《史记》，司马相如的汉赋，张骞出使西域，白马驮经东传，王羲之的书法，阎立本的绘画，李杜的诗篇，大唐的宫殿，敦煌壁画，龙门石窟，玄奘西行，鉴真东渡，都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盛大光明，东西交流景况空前。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放射出人类文明史上的又一璀璨光华。但是，在这场文化大交融中，也付出了沉重代价。王昭君的出塞和亲，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木兰从军的传说，文成公主的故事，既奏着民族融合的乐章，也含着贵门闺秀的悲歌。东晋时的衰微，南北朝的离乱，也都是这场融合的记忆。

^①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第 90 卷，第 2992 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65 年，北京。

^② 《后汉书·张堪传》，第 31 卷，第 1100 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65 年，北京。

蒙古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经过千年的文化冲突、聚合，草原文化冲突风浪虽暂时平静，森林文化冲突却波澜又起。

早在汉代，史有记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极。土地多山险，人形似夫余，而言语各异。有五谷、麻布，出赤玉、好貂。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①今黑龙江省双鸭山地区，挹娄村落遗址，村屯房屋，星布遍地。几乎每个小山丘，就是一个村落^②。虽文献记载不足，但可以看出一个文化发展的脉络来，就是这个文化从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这么一线承续下来的。

此期，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有大量的记载，如《淮南子》《三国志·魏书》《北齐书》《隋书》等。这个时期，由于森林文化的重要，相继在《后汉书·东夷列传·挹娄传》、《三国志·魏书·挹娄传》《晋书·四夷列传·肃慎氏传》《魏书·勿吉传》《北史·勿吉传》以及《隋书·东夷列传·靺鞨传》《旧唐书·北狄列传·渤海靺鞨传》《新唐书·北狄列传·黑水靺鞨传》等均有专门记载。

这个千年，森林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融，有三件大事值得关注：

其一，慕容儁在蓟城建都。鲜卑人居于大兴安岭到辽河流域，当属森林文化，亦或森林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汇区。西晋时，曾封鲜卑慕容部酋长为将军、都督。慕容部人皮肤细白，晋士族多买其妇女作婢妾，就连东晋明帝司马绍的母亲苟氏也是慕容部人。东晋永和六年（350年），前燕主慕容儁从龙城（今辽宁朝阳）向南进兵，夺得幽州，攻入蓟城。东晋永和八年即前燕元玺元年（352年），慕容儁即皇帝位，定蓟城为国都，并修宫殿、建太庙、册皇后、立太子，是为北京史上少数民族首次在北京建都。慕容儁想组成一支一百五十万人的大军，南进争雄，未果身死，在位十一年^③。蓟城作为前燕国都，仅六年。前燕鲜卑人慕容儁迁都蓟城，是森林文化民族第一次在关内北京建都。这是东北森林文化进入中原政治舞台的历史信号。

其二，大祚荣建立渤海政权。粟末靺鞨部首领大祚荣，唐初时，率众徙居营州（今辽宁朝阳）。武则天时，又率部北居古挹娄之地。唐圣历年元年（698年），在

① 《后汉书·东夷列传》，第85卷，第2812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65年，北京。

②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滚兔岭遗址发掘报告》，载王学良主编：《荒原觅古踪》，第11—24页，双鸭山市文物考古资料汇编委员会印本，2008年。

③ 《晋书·慕容儁载记》，第110卷，第2842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北京。